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和目的

大學入學考試(以下簡稱「大考」)制度，顧名思義，是爲了選拔中學生進入大學就讀所形成的考試制度。從國家發展觀點來看，一國高等教育的良窳正是其國力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標即在於培養優秀人才，而大考的施行，正是國家得以公平分配高等教育機會的主要手段。半個世紀以來，台灣地區大考制度一直肩負著爲大學選才的重要任務，儘管各界對於大考扭曲高中教學、強化升學主義、造成「高分低能」等現象有諸多批評，但它仍能維持高度的公信力，形成一種至高無上的權威，廣泛而持續地影響著好幾代的學生、老師、家長，甚至牽動整個社會。究竟這套原本只是作爲大學校院選才工具的大考制度，如何成了高中教育的「指揮棒」？它爲何具有如此的影響力？又是透過哪些方式來發揮影響力？其權威感如何形塑？何以能維持其權威於不墜？政府與命題者在大考中扮演什麼角色？如何透過大考達到教育控制的目的？大考與傳統科學文化有著怎樣千絲萬縷的關聯？又如何深深牽動千萬考生的應試生活？凡此種種，均值得一一探究。

在過去五十年中，台灣社會不論在政治或經濟上均歷經巨大轉變，經濟的發展更被喻爲「台灣奇蹟」，具有大量而優質的人力正是社會得以轉型的關鍵之一。然而，在新世紀降臨之際，面對快速變化的社會，我們需要形成新的人才觀，透過教育來培養具多元思考、獨立判斷、民主素養的現代公民。唯在「考試領導教學」的現象下，教育往往受到某種程度的扭曲；又因「升學主義」的影響，實難避免考試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因此，若能了解過去五十年來大考制度中教育控制的運作方式，縷析大考在台灣教育和社會中發揮的功能與影響，應有助於吾人理解及掌握大考種種問題。

對教育活動進行控制，旨在根據教育目的之需要，按照既定工作標準和規

範，去核查教育運作過程中所發生的每一件事，看其是否符合規定的計畫、指示及原則，明確指出實施中的缺失，以求改正。¹「控制」一詞由「控」、「制」兩個類似含義之字合成而來，在中國古籍中此二字有駕馭、協調、支配、統治或制約之義。在古希臘文獻中，則意指「掌舵人」，柏拉圖曾用以表示駕船術或操舵術，有時亦指管人術，後由亞里斯多德擴充為對社會集團或國家的管理。及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期，美國科學家維納(A. Wiener)創立「控制論」理論，「控制」作為「控制論」最基本的概念而被眾多領域廣泛運用，其內涵則更為多元且眾說紛紜。²本文所使用的「控制」一詞，基本上是取其一般性用法，而非「控制論」中機械化的定義。因此，簡言之，教育控制就是通過控制去盡力縮小受控對象的任意性空間，使教育運行不偏離預設軌道，使受控者不踰矩。

從教育控制的觀點來分析台灣地區大學入學考試，主要是基於以下考量：首先，不容諱言，政府對教育的控制是明顯存在之現象。³為鞏固自身統治基礎，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透過教育來形塑有利於統治者的認同意識。其次，從政治權力的運作和分配來看，學校正是政治社會化的重要單位，因此權力擁有者常透過國家機器對學校施予無形的控制；尤其以其所認定具有「合法性」的知識價值體系作為教育活動的張本，學校遂成為意識型態的製造工廠。學生到學校接受教育，就是在塑造成為某一意識型態的承載者，而認同於此一政治現實的合法性。⁴政府對教育進行控制的例子，在歷史上屢見不鮮，例如國民政府時期實施的黨化教育、⁵遷台後所採行的部定本或統編本教科書等等均

¹ 廖平勝，《考試學原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82。

² 例如：「控制是保證各項活動達到預期效果的職能」、「所謂控制，一般可以理解為物質相互聯繫中一類特定的關係」、「控制說到底就是一個在可能性空間內進行有目的的選擇的過程」、「控制是以保證事情按計畫發生，並且在事情進展過程中糾正任何重大的偏差」、「控制是保證目標能按計畫實現」。參見廖平勝，《考試學原理》，頁289。

³ 教育領域內有關國家角色的幾項結論，其中之一是：國家透過教育制度而增強其合法性，教育制度的擴張則是國家權力擴張的表徵。羊憶蓉等著，*教育的權利與義務*，收錄於：台灣研究基金會編，《台灣的教育改革》(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年)，頁53。

⁴ 陳伯璋，《意識形態與教育》(台北：師大書苑，民國77年)，頁6。

⁵ 陳進金，《抗戰前教育政策之研究(民國十七年至二十六年)》(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86年)，頁117。

是。一般討論政府對教育之控制，多著眼於部定教科書，例如學者即曾分析1983年版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指出其大量引用權威政治人物的言論，且書中多充斥政治意識型態的灌輸。⁶至於本文則從考試切入，主要考量於大考對高中教育的強大影響力，因此政府只要掌握大考的主導權，便能透過大考落實其教育控制之目的。早期國民政府統一大考重要目的之一，係為形塑一致的國家意識，故乃嚴格規定考試的科目；從三民主義長期成為大考的共同科目，即可見政府權力對大考運作的介入。⁷

此外，政府透過大考所進行之教育控制，亦可從大考招生政策來分析。就社會資源分配而言，高等教育不只是一種教育制度，同時也是一種社會制度，為使高等教育機會能公平分配，教育當局乃使用考試此一眾所公認之公平工具。然而，教育分配不只涉及工具理性，也涉及能否排除「不必要的干擾」因素。何謂干擾因素，舉例來說，譬如「保障名額」、「加分優待」等的訂定，均屬於分配機制中的干擾因素。政府往往可以透過招生政策的擬定，獎賞對其政權認同之人，而在大考中遂行其政治目的。

另一方面，從教育控制的權力作用來看，本文所欲討論的教育控制並不單指政府的控制；事實上，命題者(或教育者)對學科知識合理性與重要性的界定與認定，也體現了教育控制的作用。例如近十年來歷史科試題由以往強調對課文的熟悉程度，轉為重視歷史思維能力的考察，⁸正可顯示命題者得以透過大考試題來表達其對高中歷史教育改革的主張；特別在「考試領導教學」的作用下，更深化命題者對高中教育的影響力。類似情況亦見於傳統科舉考試之中，例如宋代歐陽脩倡議「古文」，便是利用科舉選才的機會，拔擢蘇軾等古文大家，而使古文運動「一舉成功」。⁹此外，法國年鑑學派在二次大戰後得以快速發展，其中因素之一亦是透過具有悠久歷史的會考制度；費弗爾(L. Febvre)、布勞

⁶ 陳伯璋，《意識形態與教育》(台北：師大書苑，民國77年)，頁227。又如羊憶蓉，《教科書的變遷(一)(二)》，收錄氏著，《教育與國家發展——台灣經驗》(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8年)，頁235-318。

⁷ 葉孟昕，《中英大學入學制度之比較研究》，國際暨南大學比較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8年，頁83。

⁸ 管美蓉，《八十八學年度大學聯考試題分析——歷史科》(台北：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民國89年)，頁1。

⁹ 何寄澎，《北宋古文運動》，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73年，頁171、185。

代爾(Fernand Braudel)等年鑑學派大師都曾進入國家會考委員會，主持歷史類的國家會考，以取得編制會考試卷之權，終使考試重點逐步轉向經濟、社會、人口、文化等新史學和年鑑學派的方向，促使教師教學和學生治學方向的根本改變。¹⁰

考試何以能發揮如此強大的作用？借用法國後現代大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說法：考試是一種技術，這是一種關於人的能見度的一種技術，用以區分、判斷和分類。¹¹人的內在本來是很難度量的，因此很難加以比較，不過考試這種技術卻能使不可見的那一面呈現出來，成為可量化、可比較、可分類、可描述，進而可加以控制。在量化、分類、比較的過程中，必需有一套「正常的標準」；例如醫學可以區分有病與否，而掌握這些學問的專家，如醫生、精神病學家等就是這些標準的維護者。¹²然而，如何標示個體的不同，以便進行分類呢？其所憑藉的技術就是考試，考試正是知識與權力結合的重要工具。

傅柯認為考試將知識建構與權力展現結合，即：一、考試(檢查)將可見性(visibility)轉化為行使權力的良機。考試(檢查)是一個「宰制的空間(space of domination)」，披上不偏不倚的外衣以進行檢查和監察。二、它亦是一個強迫受試者客體化的過程。規訓之所以可能，完全有賴一個有效的觀察與監視機制；這個機制透過使個體(受試者)所思所作完全暴露於監控之下，以達致權力行使的效果。三、權力行使時，實與文化歷史因素有關。權力並不是形而上的內涵，根據傅柯的說法，考試的儀式、方法、特點、作用、問答遊戲、評分和分類體系是一種完整的權力類型。¹³傅柯並進一步指出考試中的權力運作：「考試是這樣一種技術，權力藉助於它不是發出表示自己權勢的符號，不是把自己的標誌強加於對象，而是在一個使對象客體化的機制中控制對象。在這個支配空間中，規訓權力主要是通過整理編排對象來顯示自己的權勢。考試可以說是這

¹⁰ 姚蒙，《法國當代史學主流 從年鑑學派到新史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8年)，頁98-99。

¹¹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 現代監獄的起源》(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3年)，頁184-187。

¹² 梁其姿，悲觀的懷疑論者：米修·傅柯，〈當代〉，創刊號(1986年5月1日)，頁18。

¹³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 現代監獄的起源》，頁184。

種客體化的儀式。」¹⁴傅柯認為，權力正把我們塑造成馴服又有用的身體，然權力關係並不是從國家衍生出來的，而是因為這些權力關係愈來愈為國家所掌控，不斷的被「政府化」。因此，本文一方面擬從政府介入之角度來看考試與教育控制的關係，另一方面則將探討考試在執行中所產生的權力糾葛，¹⁵以了解知識與權力的交互運作，並進而分析在權力行使中，受試者如何抗拒被辨識及分類的過程。

事實上，政府透過大考落實教育控制之所以有效，除考試本身的特質外，亦與其所形成的社會權威感有關。大考制度在形式上保障了每一個人的考試權，排除人情關說、家庭背景及社會階級因素等干擾，而被公認為台灣最公平的制度之一。因此，台灣地區大考制度的長期存在，實與整個制度所形成的公平分配機制密切相關。由於社會對考試的高度認同，使得透過考試所進行的教育控制不但取得合法性、正當性，更具深遠影響。考試既是一種普受眾人信賴的工具與技術，又是準則兼裁判，擁有絕對權威，但透過大考制度是否就意謂符合公平分配的原則？考試過程係由人來負責執行，其層層機制能否減少人為操弄的可能？其實，從上文所提及干擾因素的角度來看，大考仍存在許多不易查覺的，因價值觀、偏見或性別差異所造成的不公平。

尤有甚者，在要求絕對公平的前提下，「公平性」在大考中乃「無限上綱」，此於傳統科舉早有先例。從科舉發展的歷史來看，唐時流行「公卷」制度，考生公然拜訪考官，或採「行卷」方式，應試者可先將自己作品呈送朝中名公巨卿，請其代為推薦；基於對考官和士人的信任，這樣的方式是為當時社會所接受的。及至宋代，由於考生人數激增，人們要求考試必須公平進行，

¹⁴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 現代監獄的起源》，頁186-187。

¹⁵ 若以傅柯的理論來分析大學聯考，其所呈現的對比可能與傅柯的看法有若干差異：例如傅柯藉以立論的考試，指的應是校內考試，而非學校外部考試，例如會考、大學聯考等制度，這是首需釐清之處，因此傅柯所提到的懲罰功能，基本上這類校內考試通常有檢定的功能，故能發揮其懲罰之效。但對大規模的聯考而言，這類考試通常具有高度的競爭性，其規訓方式主要應是透過功名利祿加以誘導。同時，不論校內考試或外部考試，均有縮小認知差距的功能，特別是當這種校外考試形成聯合方式，而為國家所介入時，其所要求的知識、能力、價值觀等之一致性正代表了一股強大而保守的勢力。考試的「規範化裁決」意謂著分數的量化與人的個體化，考試一方面能強求一致，另一方面，在評比之後形成人的個體化。考試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吃重的角色，值得探討。

「防弊」的規定漸趨嚴格，「公卷」制度廢除，科場防範更為嚴密，而失去了對士人人格的尊重和信任，科學考試制度的設計理念亦由「信任」轉為「防弊」，形成不同的考試面貌。¹⁶由於深受傳統科舉「防弊」心態影響，大考在「公平性」不容挑戰的理念下，考試的方式、試題的內容在設計上便有不同。以歷史科為例，為求閱卷的絕對公平，「非選擇題」的設計往往是採用名詞化的答案，以避免閱卷可能造成的不公，但卻忽略了非選擇題的目的在於考查考生組織、表達能力，而這項能力正是就讀大學的學生所應具備的基本能力。更甚者，大考曾在 1973 至 1984 年間，完全廢除了非選擇題，直到 1985 年才恢復。追求絕對公平的結果，會造成怎樣的問題？當科學文化遺產遇上強調多元價值的現代社會時，該如何調適與轉化，應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在大考制度下，教育控制的主要對象是高中師生，尤其是高中生。對高中生而言，大考是用以分配接受高等教育的就學機會，而高等教育不僅影響個人地位的取得，也影響個人的文化資本和生活機會。由於高等教育是屬於相對稀有的社會資源，儘管受過高等教育者未必都能謀得較高的地位或待遇，但二者相關性是很高的，也因此高等教育乃成為眾人爭取的目標。就投資報酬率而言，若能通過考試，則可一舉成名，魚躍龍門，其投資報酬率不可謂不高。唯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科舉傳統下，也形成「文憑主義」的社會文化價值觀，其對考生考試負擔、教學成效的界定、教學關係的緊張程度，甚至家長在教學關係中的角色等問題，都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此外，特重文憑所衍生的升學補習班到處林立，更形成特殊的台灣社會現象，深深影響考生的生活型態。凡此種種傳承科舉而來的應試心態，其對現代考生的衝擊，實值得進一步探討。另一方面，不論是做為中學教育與高等教育的媒介，抑或是成為教育制度與社會、政治、經濟制度聯繫的橋樑，大考制度正以一種獨特而深刻的方式影響台灣社會的發展。因此，五十年來社會輿論對此議題十分關注，隨著時代的轉變，輿論風氣也有若干變化；就一個深刻影響台灣現代社會形成的重要制度而言，了解社會輿論對此一制度的觀感有其必要性。

大考雖與教育、社會諸問題環環相扣，牽一髮而動全身，然因它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乃致吾人多「習焉不察」，反而忽略其成為研究主題之必要。但

¹⁶ 參見李弘祺，科舉 隋唐至明清的考試制度，收錄於：鄭欽仁編，《立國的宏規》(台北：聯經出版社，民國82年)，頁277。

弔詭的是，大考問題亦為許多人切身之經歷，並深入社會各層面，如同教育學一樣。在社會科學中，教育學似乎較其他學科更缺乏專業地位，普通人都可以成為自己的教育學家，教育實踐的方式往往愈來愈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與批判。¹⁷考試做為教育實踐的一個環節，同樣也成為人人可以參與的議題，以致它的觀念常被簡化，並以大眾所理解或誤解的部分再去生產、堅持或反抗。矛盾的是，儘管大考制度與生活、教育、文化甚至是國力發展息息相關，但學界研究成果卻相對較少。¹⁸因此，本文希望透過對近五十年來台灣地區大考制度與教育、政治、社會變遷的相關研究，發揮拋磚引玉的功效。

二、研究回顧與史料分析

整體而言，學界對於近五十年來大考相關議題的研究成果並不多見，在現有著作中，多係探討台灣的大學入學考試制度。其中丘愛鈴，〈我國大學聯招政策變遷之研究(1954-1997)〉，¹⁹完整地呈現了台灣地區實施大學聯考的進程，作者在歸納招生方式、機構、考試方式、升學優待與招生名額等五方面的變遷情形後，提出大學聯招政策的人治色彩、國人對招生公平性的重視、招生方式脫離不了考試，以及科層組織結構僵化等特質，全篇資料豐富詳實，值得參考。唯該文側重政策面的檢討，對於考試內容以及對社會文化層面的影響則著墨較少。鄭秋霞，〈從教育改革談台灣地區大學入學制度之變革(1994——迄今)〉，²⁰該文有系統地介紹了從 1994 年推薦甄選實施以來，各項大學入學制度改革的过程、特色及產生的問題。楊李娜，〈台灣的大學入學考試制度研

¹⁷ 霍斯金，〈教育與學科規訓制度的起源〉，收錄於：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文化／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學科、知識、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23-24。

¹⁸ 傅柯也曾對考試史研究受到冷落提出不平之鳴，他寫到：「人會撰寫關於對先天盲人、狼孩或催眠術的實驗的歷史。但是，有誰會寫更普遍，更富於變化，但也更有決定意義的考試的歷史？」參見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 現代監獄的起源〉，頁184。

¹⁹ 丘愛鈴，〈我國大學聯招政策變遷之研究(1954-1997)〉，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87年。

²⁰ 鄭秋霞，〈從教育改革談台灣地區大學入學制度之變革(1994——迄今)〉，南華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究〉，²¹該文是以教育學的基本理論為基礎來探討台灣地區大學入學制度的演變，主要著重於大學聯考與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歷史考察與理論分析，並以1994年開始的「推薦甄選」入學方案作為個案研究，從高等教育的發展、心理學的多元智力、教育機會均等及考試等理論來分析台灣的大學聯考的問題，並在結論中提出改革大學入學制度的對策。該文以90年代多元入學方案的實施為探討重心，文中大量引用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相關研究報告及文獻，且充分利用網路資訊，因此資料蒐集頗為豐富，並從高等教育學觀點進行分析，提供不同於歷史或社會學的視角，對多元入學方案在高等教育的發展及意義提出深入的分析。同樣以推薦甄選為主題的學位論文，包括：陳昌媛，〈大學科系與高級中學對大學甄選入學之態度評估與研究〉，²²該文從實證調查著手，對高中資料的分析發現，一般高中生均希望利用推甄進入更理想的大學科系就讀；對大學科系的研究顯示，大學科系仍以聯招為主要招生管道。另一篇是林曉梅，〈大學「推薦甄選」制度之研究(1993-2000)〉，²³該文採用比較研究及深度訪談等研究方法，分析推薦甄選與申請入學方式形成原因、實施情形、特色與影響，資料詳實豐富，對研究大學甄選入學制度具有參考價值。蔡宜芳，〈公立大學校院入學機會之調查研究——新舊制度入學學生的比較〉，²⁴該文對2002年大一新生進行問卷調查，其重要研究結論包括：新制凸顯出「申請入學」的公平性有待加強，「考試分發入學制」明顯比「舊制聯招」更能招收對就讀科系較有興趣的學生，但學生補習有愈趨增加之勢。

其次，本文在論述過程中會涉與其他國家大學入學制度的比較，以突顯台灣大學入學考試制度之特殊性。就探討各國大學入學制度的部分，有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主編的《世界各國大學入學制度之改革動向》，²⁵該書為論文集，

²¹ 楊李娜，〈台灣的大學入學考試制度研究〉，廈門大學高等教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

²² 陳昌媛，〈大學科系與高級中學對大學甄選入學之態度評估與研究〉，東吳大學經濟所碩士論文，1999年。

²³ 林曉梅，〈大學「推薦甄選」制度之研究(1993-2000)〉，台東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²⁴ 蔡宜芳，〈公立大學校院入學機會之調查研究——新舊制度入學學生的比較〉，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²⁵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主編，〈世界各國大學入學制度之改革動向〉(台北：五南圖書公司出版，民國72年)。

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大學入學制度的歷史發展；二是世界各國大學入學制度的現況與改革動向；三是大學入學制度與其他相關問題研究。第一部分係有關抗戰時期統一招生與分區聯合招生的介紹，由於作者王煥琛收錄了當時的招生辦法大綱及各科試題，對於了解當時大學入學條件及對學生程度之要求提供了直接史料，具有參考價值。此外，Max A. Eckstein & Harold J. Noah 原著，陳坤田等譯，《邁向大學之路——各國考試制度的理論與實際》(*Secondary School Examination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Policies and Practice*, 1993)，該書詳述英國、法國、德國、瑞典、美國、日本、中國大陸及前蘇聯等八國的中學畢業考試以及與大學入學相關的資格考試制度。該書從應考者和學校、施測機構的組織與管理、考試內容本身、考生負擔、學業成功率及考試政治等角度，全面地探討考試在這八國的不同面貌，提供了相當豐富的資料和獨特觀點，深具參考價值。唯該書並未論及台灣的部分，殊屬可惜。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所編，《各國大學入學制度介紹——國家篇》，則是針對台灣地區、中國、日本、韓國、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等八國的入學制度及招生制度進行介紹，由於該書蒐集了各國重要大學的招生說明等資料，彙編出上述八國大學的招生理念、規準及條件等內容，實屬首創，對於了解各國大學入學招生理念及其實際運作情形提供具體參考。另有葉孟昕，〈中英大學入學制度之比較研究〉，該論文係對台灣及英國的大學入學制度的演進歷程、實施現況、制度特色及問題進行比較研究，對於台灣及英國大學入學制度提供了可資比較的資料。

從教育管制(或控制)的觀點談升學主義的論文，則有鄭婉琪，〈政治控制、教育管制與升學主義：歷史社會學的詮釋〉，²⁶該文嘗試以歷史社會學的研究取徑著手，並以「教育結構與經濟結構」相配合作為主軸，論述國家如何透過教育管制形塑教育結構，從政治控制的角度思考教育管制，並探討二者與升學主義的關係。該文欲挑戰「升學主義」是源於傳統文化的說法，認為社會上文憑主義的盛行應與國家主動建構出的教育結構有關；同時，作者也質疑台灣教育政策長期以來服膺經濟上人力資本規畫的合理性。

上述研究成果的共同特色就是多從教育學及社會學觀點切入，缺乏由歷史發展脈絡來探討大學入學考試制度的演變，也未能深究命題權對知識宰制的面

²⁶ 鄭婉琪，〈政治控制、教育管制與升學主義：歷史社會學的詮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貌，同時亦未對高中生及社會輿論反應加以分析，因此本文擬就上述部分再加闡釋，期能補充此議題研究之不足。

就本文研究材料而言，各次教育年鑑提供了政府觀點，對於了解招生政策的形成、推動及評價有參考價值。從 1964 年開始編製的聯招工作報告，詳細保留聯招各組工作內容、職掌、經費預算、報名與錄取人數、命題與閱卷計畫、各科試卷、考生答題狀況及試題統計分析等資料，可為探討聯招實際工作內容的重要依據。此外，教育部委託進行的研究，如〈大學入學考試對高中教學之影響及其改善途徑研究報告〉等，均有助於了解各時期對解決聯考問題的重要思考方向。比較令人遺憾的是，教育部與大考相關的檔案已在水災中損毀。唯在丘愛鈴的博士論文中曾大量引用相關文件，稍可彌補此一遺憾。

對於 1949 年以前大學入學考試的情形，《中國考試制度史資料選編》蒐集了民初各大學院校招生及考試試題等相關資料，對於此一時期考試面貌的理解具有參考作用。此外，《中央日報》保留 1949 年以前統一考試招生的情形，對於了解時人對統一考試的看法甚具參考價值。

大學入學考試相關事宜，不但受到高中師生的關注，也是輿論討論的話題。從 1954 年開始，報紙即大篇幅報導大考相關事宜，就筆者蒐集的資料來看，這半世紀以來，與大考有關的報導、社論或投書超過 500 篇以上，舉凡大學聯考的試務日程、技術改進、試題得失、制度改革、答案爭議、選填志願、聯考存廢、對高中教育的影響、如何準備考試以及多元入學方案的優劣問題等，均是輿論討論的焦點。透過對報紙內容的探究，可以真實了解時人對這些問題的看法，甚具史料價值。

除了上述資料外，大考中心的研究報告亦深具參考價值。從 1989 到 2001 年之間，大考中心已出版各類研究報告，包括：(一)關於大學入學制度改革 48 本；(二)關於資訊及輔導類 43 本；(三)關於命題類及試題分析，各學科共 230 本；(四)其他類 35 本，總計相關研究報告共 356 本。其中與本文有關的是第一類制度探究及第三類中國文科和歷史科試題研發部分，以下僅扼要說明之：

就制度改革方面而言，〈我國大學入學制度之研究〉此一報告主要是關於大學聯招的改革方案，報告中首度提出大學選才自主及導引高中正常教學的改革原則，此一研究正是日後有關規畫「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各類研究計畫之先趨。在確定大學入學考試不宜輕言廢除之後，大學入學考試對中等以上教育

影響之專題研究乃益發重要，期能避免重蹈傳統聯考的覆轍。此方面主要研究有二：〈大學聯考對高中教育的影響〉及〈大學聯考對大學教育的影響〉，二者均採問卷調查方式進行，前者主要從四個面向探討：(一)高中教育目標的達成；(二)高中各科教學的情形；(三)學生的學習方法與態度；(四)高中教學正常化。該文提供 1990 年代初期高中教育的現況調查，具有參考價值。後者是從：(一)大學聯考對大學通才教育的影響；(二)大學聯考考試內容與制度對大學教育的影響；(三)大學聯考對大學生學習態度、思考方式及課外活動參與之影響等面向，分析大學聯考對大學教育的衝擊，對於了解 1990 年代初期大學生對大考的看法及其所受之影響，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除檢討舊制度的缺失外，大考中心也嘗試提出不同以往的招生構想，〈推薦甄選入學方式之研究〉(一)及(二)即為重要研究成果。在此一研究報告中，提出了「推薦甄選入學方式(草案)」，成為日後實施「推薦甄選」的基本藍圖，同時也呈現了「推薦甄選」制度從研發到成形的清楚歷程，深具史料價值。其他相關研究還包括：〈大學入學加計高中在學成績方案之研究〉、〈改進大學夜間部招生方式研究〉、〈我國大學入學基礎科目考試規畫研究(一)〉、〈預修甄選入學之研究〉等，這些研究報告對於了解「多元入學方案」的成形歷程裨益甚大。

大考中心在歷經三年研究，統合將近五十本相關研究報告及舉辦五次大型研討會，以集思廣益、凝聚各方共識後，提出了〈我國大學入學制度改革建議書——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此即為日後各項入學制度改革之基石。該建議書對於改革之規準、原則，以及各方案之初始面貌，均有清楚的陳述，是研究近十年來大學入學制度改革的重要文獻。

「多元入學方案」提出之後，大考中心將考科規畫中二段式考試構想作了進一步探究，其中〈我國大學入學基礎科目考試規畫研究(二)〉一文，將基礎科目及指定科目考試的目的、範圍、題型及試卷架構加以定義及區別，成為日後實施「學科能力測驗」及「指定科目考試」的依據。至於大學學系需用多少科成績才得以有效選才？若採大一不分系的構想，可否只考國、英、數三科等問題，則是透過〈簡化考科大一不分系招生辦法〉此一研究來探討；從問卷調查及統計分析著手，發現以任三科成績的組合即可進行分發。有此研究結果支持，日後「多元入學新方案」中的「考試分發入學制」乙案考科數目為三，即

是依此而設計。唯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只考國、英、數三科固可紓解學生準備考試的負擔，但必然會扭曲高中的教學，故簡化考科不宜全面實行，只能由部分大學採用。

除了上述資料外，大考中心另編製有十一次研討會實錄，詳細紀錄成立初期關於大學入學制度公開討論的結果。如一至四次研討會的主題包括：探討大學聯考制度的得失、了解高中及大學教育之需求與問題、研擬良好的大學入學方式之規準，以及有關大學入學制度改革之各項初步建議；第五次則是討論大學入學制度改革建議書草稿，均為研究制度改革的第一手資料。此外，在逐步落實多元入學方案過程中，大考中心亦著手展開對新入學方案的追蹤調查。自 1994 年「推薦甄選」試辦以來，從次年起到 1998 年止，大考中心每年均進行「推薦甄選追蹤調查研究」，以校為單位從事個案研究，記錄各校辦理推甄的理念與實務，對於了解各校自主招生之歷程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除研究入學制度外，命題改進亦是大考中心研發的重點。從 1990 年迄今，大考各學科均已展開長達十四年的命題研究工作，研究報告大抵可分為三個階段：(一)1993 年以前，各學科命題研究係以檢討傳統大考試題為主，著眼於試題問題的回顧。(二)1994 至 1998 年間，為設計二段式考試中「基礎科目考試」之命題方向，開始展開「基礎科目考試規畫」的試題研發工作。以五年為期，完成了測驗目標之研擬、新題型之開發、命題原則之研擬、參考試卷之形成及命題參考手冊之編製等相關工作。(三)自 1999 年起，各科試題研發工作進入「指定科目考試規畫研究」階段，展開「指定科目考試」各項試題研發工作。上述各階段試題研發報告，實為了解近十多年來大考試題改進的重要參考資料。不唯如此，大考中心自 1993 年起，每年均針對各學科大考試題進行試題分析工作，對於了解各年度大考試題的特色提供豐富的資訊。

最後，由大考中心編輯出版的論文集《十年辛苦不尋常》，收錄將近九十篇有關大學入學考試改革歷程的論文，包括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創立及發展經過的憶往、推薦甄選推動時期的回顧、考招分離時期的展望，以及赴英、美、日、大陸等地考察交流的經驗談。此論文集不僅對於大考中心的成立及多元入學方案的研擬與推動，提供珍貴的一手史料，同時亦對近十五年大學入學制度之改革，做一系統而全面的回顧，甚具參考價值。

三、研究方法與內容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擬從下述二方面著手：一、廣泛蒐集各類相關資料，包括：1.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所藏資料、工作及研究報告；2.聯招會及招策會出版之各年度大學聯考工作報告(含各年度試題及會議記錄)；3.各種教育、人口及經濟發展等統計資料；4.相關之報紙、期刊、論文等資料。二、進行問卷調查，期能透過資料的完整蒐集，運用歸納、分析、比較、綜合等方法，更清晰地爬梳大考中教育控制之面貌。

至於本文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緒論將說明研究動機、目的、方法、文獻探討、考試的一般性質及教育控制的意涵。

第二章討論大考制度的歷史淵源。主要是以歷史演變觀點來看大學入學制度的發展，從清末民初各大學單獨招生的情況，以至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統一考試招生的種種變遷，作一歷史考察，可為了解日後台灣地區實施大考制度及其演變的歷史背景。

第三章探討 1949 年政府遷台後，大考制度在台灣之建立與演變。遷台初期，在台大學校院仍採單獨招生方式；唯自 1954 年起，大考制度在政府主導下確立，迄今已歷五十年，其間的演變與政治發展確有若干程度的糾結，頗堪玩味。

第四章主要討論政府如何透過大考進行教育控制。首先是探討政府如何以大考考科建置來控制高中課程；其次，亦嘗試從政府對招生政策、方式、名額及加分優待等之管制，來說明政府如何利用大考進行教育控制。

第五章著重於命題者如何透過大考進行教育控制，係以國文及歷史試題之演變為例。長久以來，國文和歷史一直被視為是形塑「國家認同」的主要學科，本章即欲分析此二科試題之內涵及演變，探究命題者如何透過試題形塑國家意識形態，以及其對高中教育所產生的規訓功能。

第六章將從教育控制的形塑對象來分析大考的影響。大考宰制許多考生的高中生活，左右他們的入學機會，本章擬透過歷次問卷調查之比較，以呈現高中升學文化的真實樣貌。此外，本章亦擬分析五十年來輿論對大考制度的衝擊

與回應，進而彰顯社會對教育控制的反應。

第七章結論則是總結各章論點，嘗試對大考制度相關問題提出個人的看法與建議。

年鑑學派大師布洛克(M. Bloch)曾提出其著名公式：「通過過去來理解現在，通過現在來理解過去」²⁷。英國史家卡爾(E. H. Carr)也提到：歷史是「歷史家和事實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現在和過去之間無終止的對話。」²⁸旨哉斯言。面對當前台灣教育改革問題重重，欲探究此一現狀之淵源，恐須回到歷史縱深之中。本文希望透過回顧過去大考歷程，檢視教育控制如何進行，以呈現對此問題真切的了解。

²⁷ 姚蒙，《法國當代史學主流——從年鑑派到新史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8年)，頁46。

²⁸ Edward H. Carr 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84年)，頁23。